

宜将剩勇追穷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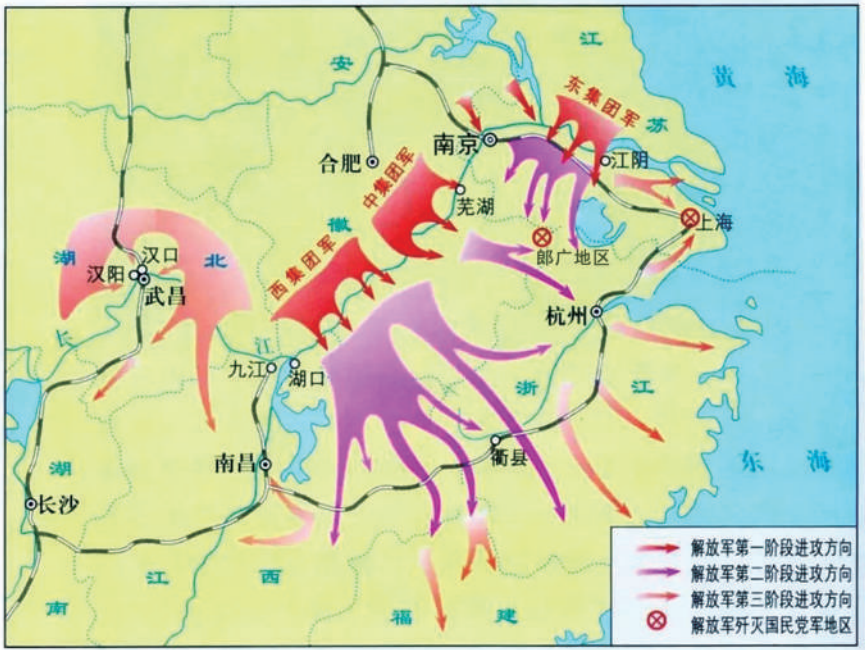
——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郎广围歼战

■王凤春 李德良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集团已江河日下,军事、政治、财政、外交濒临绝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党我军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华夏大地迎来蓬勃的春天。在中央军委周密擘画和精心部署下,我军以雷霆之势迅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取得渡江战役(也称“京沪杭战役”)关键性的第一阶段胜利,先后解放芜湖、南京、镇江等重要城市。4月28日,从南京、镇江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齐涌入安徽东部长兴、广德、郎溪一线以北地区,试图经此地逃退至杭州和上海。我军东、中两路大军在粟裕指挥下,采取东西对进、钳形夹击的战术,仅用2天时间围歼敌6万余人、俘敌8万余人。

着眼全局,筹划选择作战地区 and 目标。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进攻的决战阶段,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且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接连战败后,作战兵力削弱至150万,军中士气空前低落。1949年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由渡江战役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兵力编成东、中、西三路突击集团,于长江下游的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拥兵44万的汤恩伯集团,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境,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渡江战役之整体由渡江、歼敌、攻城等一系列关键任务构成,各部分有机联系、互为条件,其中任一行动的成败,都可能影响后续作战发展趋势,制约后续作战行动。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着眼全局,把歼灭敌人重兵集团与夺取城市、地方结合起来,力求尽可能减少战争的破坏,完整接收大城市,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1949年4月20日晚8时,作为中突击集团的第7、第9兵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长江,迅速占领沿江南岸的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21日晚,由第二野战军组成的西突击集团,突破敌枞阳至湖口段江防;由第三野战军第8、第



渡江战役示意图。

10兵团组成的东突击集团,突破敌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江防,先后登陆长江南岸并继续向纵深进攻,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任务顺利完成。

胜势虽然在我,但敌快速南逃,致使我歼敌有生力量的作战目的无法达成。粟裕认为,第一,逃窜之敌若进入杭州和上海,获得喘息时间,必将增加战役下一阶段의 攻城难度,在野外歼敌与在城市歼敌,代价悬殊。第二,若敌人溃散为匪,占山为王,势必造成更大混乱,大大分散我兵力,因此必须采取东西合围战术,布设口袋阵,把敌人赶进口袋、集中歼灭。第三,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一带属山区地形,是围歼大股敌人的理想战场,1945年的天目山战役就是在这—地区取得优异战果,创造了我军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的运动战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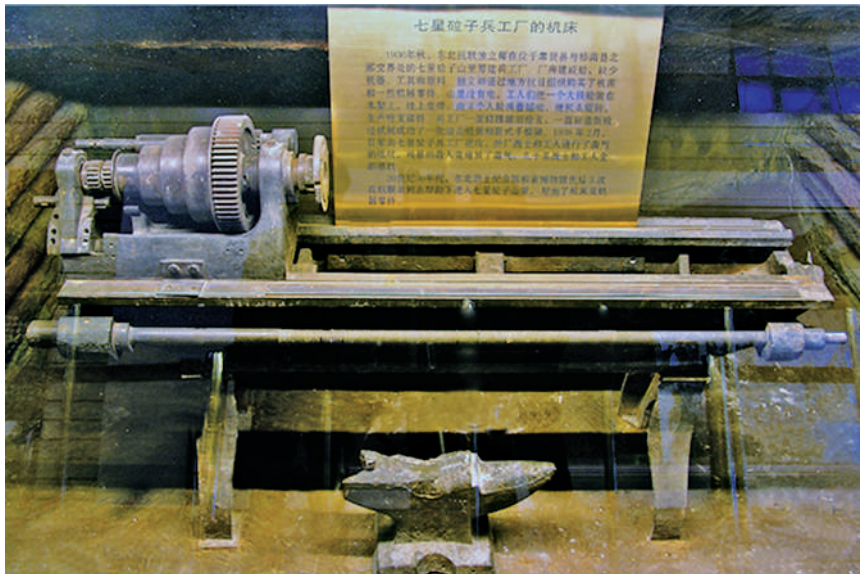
果敢机断,力促作战进程衔接与递进。面对攻势如潮、猛打猛进的解放军部队,国民党一线守军抵抗微弱,二线兵力更为空虚。为逃脱主力部队被分割围歼的命运,保存实力以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下令于4月22日下午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

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退却,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于次日上午撤向广州、桂林等地。敌人加速逃撤,战场局面突变,若不加快作战进程迅速合围及时把口袋扎紧,无疑会给京沪杭战役全局带来压力与后患。

粟裕、张震于22日、23日、24日连续发出多道电令,命令中、东两突击集团加速东西对进形成合围,力促战役由渡江阶段向歼敌阶段递进,并针对当前形势对各部追击行动作出调整,令第9兵团除以第30军监视芜湖之敌待第二野战军接替外,其余各军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疾进;第7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迅速将攻击方向转至南陵以东宣城,在第9兵团右侧成梯次队形前进;第8兵团第35军、第34军警备南京、镇江、丹阳、金坛,第20军、第26军归第10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溧阳之线疾速南下,尾追南京、镇江地区逃敌;第10兵团主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以求在吴兴、长兴与第9兵团会师,切断宁杭公路,断绝敌人退路。各追击部队接到命令后,坚决贯彻上级指示,不为小股敌人所阻惑,发扬连续作战、不怕

隐藏深山造枪弹

■仇朝勇



东北抗联七星砬子兵工厂的机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三楼展厅里,陈列着一台外形完整、有部分零件残缺的老式机床。这是东北抗日联军七星砬子兵工厂使用过的机床。抗战时期,它藏于深山,为前线部队源源不断地制造打击日军的枪支弹药,是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难、自力更生制造武器的历史见证。

1936年夏,祁致中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转战依兰、桦川、富锦、宝清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随着战事增多,部队武器紧缺、弹药不足的问题越发严重。祁致中与中共富锦县委书记刘忠民、抗联第6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共同决定,在七星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建立一处兵工厂。

七星峰俗称七星砬子,位于黑龙江省桦南县和集贤县交界处,这一带山林密、易守难攻,是东北抗联第6、第7、第11军等北满抗联部队开展抗日活动的根据地。

祁致中派抗联独立师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和团长叶万海,带领数十名抗联官兵,用马驮着工具和粮食进入七星砬子山下,开始建设兵工厂。祁致中与中共党员胡志刚派人从奉天兵工厂请来陈晓祥、苏中仁等近20名技术工人,又从清华大学等处拿到图纸,开始研制武器弹药。抗联独立师分别在密林深处建起3个车间。第1车间是造枪车间,第2车间是弹药车间,均设在老道沟;第3车间是修械所,设在小白砬子。

七星砬子兵工厂车间建成后,最急需的是用于加工零部件的机床。日伪当局为防止机床外流,对机床销售管理非常严格,专门规定购买机床者除现金外,还必须要 有3家店铺进行担保。祁致中派人赶赴佳木斯,暗中刻制了3家店铺的图章,还制作了担保条,最终从一家工厂买到机床。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他们把机床拆开,装在满载谷草的马上,混过敌人的检查站,然后用爬犁运进山

里。此后不久,崔振寰等带领10名抗联官兵,与胡志刚、陈晓祥一起赶到集贤等地,几经周折又买到3台旧机床和部分工具。

山里没有电,机床无法运转。为解决动力电的问题,兵工厂的工人们利用附近哈达密河丰富的水资源,筑起了一条小水坝,用水轮带动发电机发电。冬季河水结冰进入枯水期,工人们又开动脑筋,将缴获的敌人汽车上的发电机拆下来,用煤油发电。有时油料短缺,工人们就把一个大铁轮装在木架上,挂上皮带,由4个人轮换摇动,使机头旋转,用人工办法解决供电难题。兵工厂使用的钢材原料,开始时主要靠从民间购买,抗联独立师将官兵分散到依兰、桦川、勃利等县,购买了部分废旧钢材,解决了早期原料供应问题。后来,为补充钢材,抗联独立师还出兵长发电火车站,夺取了日军屯放的一批钢轨,为兵工厂争取了重要的生产原料。

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一面修理破旧枪支,一面研究制造新枪。1936年冬,七星砬子兵工厂生产出首批100多支“匣子”手枪。由于手枪在喷漆时使用豆油烤制,颜色很像乌鸦的黑翅膀,所以大家干脆叫它“老乌鸦”。祁致中试枪后非常满意,专门为兵工厂召开了庆功会。兵工厂趁热打铁,试制成功并使用驳壳枪子弹的手提冲锋枪。1937年春,兵工厂厂长韩立中与胡志刚等技师,又试制成功了发射三八式步枪子弹的直把轻机枪。弹药车间则研制出杀伤力较强的瓜形手榴弹。这些武器被及时输送到部队,补充了部队武器消耗,加强了部队作战能力,极大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热情。七星砬子兵工厂由此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为表彰七星砬子兵工厂的创造精神,东北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兼第6军政委李兆麟专门前往兵工厂慰问。

牺牲的优良作风,不分昼夜,风雨兼程。至27日夜,第9兵团与第10兵团于吴兴会师,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66、第51等军残部包围于郎溪县城以东、广德县城以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范围内。

灵运用兵,全力推进战役阶段转换。在解放军平行追击、超越追击下,国民党军被压缩至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为更好协调各军围歼逃敌和早日解放杭州,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决定,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以第9、第10兵团为主力全歼被围之敌,第7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杭州进击,抢占钱塘江大桥。

第9兵团以多路向心突击、钳行夹击、猛插猛打的战法实施围歼,具体部署是:第8兵团第24军由广德县城及以东地区向北攻击,第25军由郎溪县城、钟桥(郎溪县城以北)地区向东攻击;第9兵团第20军由梅渚、杜渚(溧阳县城以南)地区向南攻击,第30军由广德县城以西地区向北攻击,第33军由天平桥(广德县城以东)地区向北攻击;第10兵团第28军由吴兴县城向西攻击,第31军由夹浦(长兴县城东北)、小浦(长兴县城西北)地区向南攻击;第7兵团第23军在归建途中由砖桥、白岙(长兴县城西北)向南攻击。国民党军虽然借助武器装备优势组织抵抗,但部队处于混乱状态,经过28日一天战斗,逃敌大部被歼灭,残部向东溃退至广德县城以东独山镇、界牌地区。至29日下午激战结束,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大部共计6万余人,俘敌8万余人。至此,郎广围歼战宣告胜利。

郎广围歼战是渡江战役中十分重要的局部战役,也是解放战争后期长短军阶段的一次大捷。此战持续时间短、作战进程快,解放军指战员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关键战机,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英雄气概,发扬“跑得、打得、饿得”的勇猛顽强作风,实施快追、快截、快堵的战法最终获得大胜,为继续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有利条件。

史说新语

1938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日伪军派兵偷袭兵工厂,抗联独立师警卫部队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工人们为防止损失,将大件设备拆开埋到地下,小的设备转移到其他地方,待战斗结束后,再把机器重新组装以恢复生产。日伪军虽多次对兵工厂进行破坏,但每次都遭到抗联独立师的灵活反击。七星砬子兵工厂的抗联将士和工人,住的是地窖子,吃的是野菜和野果,面对的是边打边干的任务,在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两年多。

1939年初,日军为彻底摧毁兵工厂,调集3000多名日伪军向兵工厂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抗联主力都在外线作战,守卫兵工厂的仅有80多名官兵和工人,他们掩埋了机床等重要设备,顽强地迎战敌人。这场80多人对阵数千敌人的战斗持续了3天,抗联将士和工人共毙敌数百人。残暴的日伪军向抗联官兵和工人掩体施放毒气,最终除3名受伤官兵突围下山外,其余守工厂的官兵、工人全部牺牲,兵工厂也惨遭破坏。

1955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和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请抗联老战士张凤歧和熟悉七星砬子兵工厂遗址的石金生等人担任向导,在兵工厂遗址附近挖掘出一些零部件,组装成这台机床。如今,这台带着锈迹的机床静静地摆放在展厅中,诉说着昔日抗联兵工厂的生产和斗争情况,传递着东北抗联将士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精神力量。兵工厂的抗联往事,永远镌刻在了七星峰的巨石上:八十勇士登崖峰,奋战山关日夜行,击退倭寇三千众,壮士鲜血染七忠,骨林立冲霄汉,洒泪青峦祭英灵。

链接历史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激烈对抗。随着战事不断升级,我军伤病员数量增加、伤情种类变化,给战场救护工作带来较大挑战。参战的各级卫勤力量在志愿军后勤部的统一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研究制定出一系列战场救护措施,圆满完成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卫勤工作,为我军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面临的战场情况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有很大差异,卫勤保障需求也有很大变化。从武器装备上看,“联合国军”装备有数量庞大的火炮,且能得到空军战斗机、轰炸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使得我军官兵的伤情多以炸伤为主,通常出血量大、情况危急。从战术打法上看,在以运动战为主的抗美援朝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我军穿插、迂回的距离较远,且多处在山岳丛林地带,前线官兵负伤后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后送转运,无形中增加了战场急救的难度和工作量。从季节情况看,我军入朝后,朝鲜半岛进入严寒漫长的冬季,而第一批入朝部队多从华中、华南地区抽调,官兵对寒冷天气难以适应,冻伤、肠胃病频发。尤其是处于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9兵团,还没来得及补齐冬装就紧急入朝,在长津湖一带的高原地区与敌人恶战,冻伤减员情况尤为严重。

为解决这些问题,志愿军后勤部对从前线获得的宝贵数据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并结合部分单位已经采取的有效措施,对全军的战场救护工作作出全面具体指导,取得显著成效。

优化力量编组,构建抢救链路。为增强火线急救力量,步兵连队设立了专门的救护组,通常由副政治指导员率领,组员由连队的2名卫生员和数名理发员、炊事员等组成。在战斗中,分为3个小组,一组跟随前沿的主攻排行动,主要任务是进行伤员搜索、紧急包扎和转运;一组位于连指挥所附近,既能将前线送下来的伤员向营医务所转运,又能根据战斗情况随时向重点方向加强救护力量;一组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替其他两组的任务。在战斗过程中,3个小组可以交替跃进、循环使用,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也能确保抢救伤员不落空、不间断。比如,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第113团的1个营在反击成功后,通过营连救护组交替救治转运的方法将所有伤员转移至坑道;友邻第135团1连的救护组,在数小时的高地攻坚战中连续后送伤员42人,战场救护效率大为提升。

强化转运力量,避免二次伤害。志愿军为加强伤病员转运过程中的指挥协调,在同一个后勤分部的兵站、医院和铁路运输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建起联合伤员转运组,由兵站首长、医院院长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直接调配使用空回的货运列车。为确保转运过程妥善安全,志愿军后勤部要求各军、师医院做到“五不转”,即“手续不清不转、未作妥善处理不转、吃不饱穿不暖不转、病情过重过轻不转、未解大小便不转”。各兵站医院也都建立了护送小队,编制有队长、军医、护士、炊事员等共计45人,可担负300人至500人的伤员列车护送任务,在后送途中为伤员处理伤口、诊疗送药,并对可能出现的传染病进行积极防治,避免出现后送途中伤员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仅1953年下半年,多支列车护送队伍活跃在抗美援朝的卫生救护战线上,顺利向国内后送伤员5万余人。

组织技能培训,夯实急救基础。针对志愿军作战具有奔袭距离远、战线长、伤情易危重等特点,志愿军后勤部号召在参战部队开展以“自救互救”为主要内容的战场救护训练。在战斗间隙,官兵多进行搬运、止血、固定、包扎等救护训练,一来能够提升一线官兵的急救和生存能力,二来可以进行适当休息以恢复体力。到了上甘岭战役准备阶段,参战部队多次组织团级医护人员到前沿进行普及培训,官兵100%会包扎,40%会止血和固定,大大提升了部队的火线抢救能力。对卫生员则加强军事素质的培养和战斗技能

「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战场救护

■周一

的培训,并强调以“不丢掉一个伤员,不漏编一个伤口”的做法,以“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的战斗精神,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全力抢救伤员,提升抢救效率。

打造支前力量,合理分工合作。入朝之初,我军延续了以往在国内战场开展民工支前的做法,动员征调数量庞大的民工担任担架队员,从事火线上的伤员后送任务。然而,朝鲜战场不同于国内,敌军火力威胁严重,对于没有经受过系统严格军事训练的支前民工来说,冒着枪林弹雨后送伤员,不仅难以克服畏惧心理,而且受伤甚至牺牲的概率大大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东北军区下令重新组建11个民工担架团,以军区区内现有的部分团营空架子为基础,安排经验丰富的军事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他们组织民工先在国内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待合格后再入朝参战,且主要承担后方的担架运输任务,火线运输则交给团营一级的卫生救护人员。这样一来,具有一定军事素质、专门从事担架转运任务的民工担架团大量进入战场,极大缓解了卫生救护压力,伤病员的救治效率显著提升。

突出政治工作,开展立功运动。面对困难重重、充满危险的战场救护任务,广大卫勤官兵和支前群众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提振官兵士气,各级政治部门在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的指导下开展了广泛的立功运动。一时间,卫生员、救护员、担架员互相比拼,掀起急救战线上的比武热潮。第38军某团卫生员靳福祥,在一只手臂受伤的情况下,完成了抢救28名伤员的任务,被记大功一次。此外,各运输线路也开展了后送伤员评优评奖活动,将后送伤员的数量与前运物资的数量之和,作为评判列车车组工作绩效和立功受奖的重要依据,大大提升了后运伤员的主动性积极性。



1952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员在战场上为伤员包扎伤口。